

清华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丛书



Tsinghua
theses

从社会建构主义到社会实在论： 麦克·扬教育思想转向研究

许甜 著 Xu Tian

From Social Constructivism to Social Realism:
Research on the Change of Michael Young's
Educational Thoughts

清华大学出版社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清华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丛书

从社会建构主义到社会实在论： 麦克·扬教育思想转向研究

许甜 著 Xu Tian

From Social Constructivism to Social Realism:
Research on the Change of Michael Young's
Educational Thoughts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从英国教育社会学家麦克·扬一生的学术思想入手,聚焦他从早年宣扬社会建构主义到晚年转向社会实在论的知识观的思想历程,将其代表性思想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分别阐述了这三个阶段中他对知识、课程、教育的主要观点,分析了不同阶段差异性观点产生的社会因素、个人因素、学术环境因素,探讨了其思想发生变化的主要方面,并揭示了这种转向中蕴含的教育学者对知识本质属性、知识分类与分化、知识发展与传递、知识与教育实践关系等认识的不 断 升 华,对 麦 克 · 扬 的 学 术 地 位、学 术 贡 献、理 论 的 价 值 及 局 限 性 进 行 了 全 面 总 结。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社会建构主义到社会实在论:麦克·扬教育思想转向研究/许甜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

(清华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丛书)

ISBN 978-7-302-49374-7

I. ①从… II. ①许… III. ①教育思想—研究—英国—现代 IV. ①G40-09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14921 号

责任编辑:梁 斐

封面设计:傅瑞学

责任校对:王淑云

责任印制:刘海龙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三河市铭诚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55mm×235mm 印 张:16 字 数:270 千字

版 次: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99.00 元

产品编号:077095-01

一流博士生教育 体现一流大学人才培养的高度(代丛书序)^①

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根本任务。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本科教育是培养一流人才最重要的基础,是一流大学的底色,体现了学校的传统和特色。博士生教育是学历教育的最高层次,体现出一所大学人才培养的高度,代表着一个国家的人才培养水平。清华大学正在全面推进综合改革,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探索建立完善的博士生选拔培养机制,不断提升博士生培养质量。

学术精神的培养是博士生教育的根本

学术精神是大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者与学术群体在学术活动中坚守的价值准则。大学对学术精神的追求,反映了一所大学对学术的重视、对真理的热爱和对功利性目标的摒弃。博士生教育要培养有志于追求学术的人,其根本在于学术精神的培养。

无论古今中外,博士这一称号都是和学问、学术紧密联系在一起,和知识探索密切相关。我国的博士一词起源于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是一种学官名。博士任职者负责保管文献档案、编撰著述,须知识渊博并负有传授学问的职责。东汉学者应劭在《汉官仪》中写道:“博者,通博古今;士者,辩于然否。”后来,人们逐渐把精通某种职业的专门人才称为博士。博士作为一种学位,最早产生于12世纪,最初它是加入教师行会的一种资格证书。19世纪初,德国柏林大学成立,其哲学院取代了以往神学院在大学中的地位,在大学发展的历史上首次产生了由哲学院授予的哲学博士学位,并赋予了哲学博士深层次的教育内涵,即推崇学术自由、创造新知识。哲学博士的设立标志着现代博士生教育的开端,博士则被定义为独立从事学术研究、具备创造新知识能力的人,是学术精神的传承者和光大者。

^① 本文首发于《光明日报》,2017年12月5日。

博士生学习期间是培养学术精神最重要的阶段。博士生需要接受严谨的学术训练,开展深入的学术研究,并通过发表学术论文、参与学术活动及博士论文答辩等环节,证明自身的学术能力。更重要的是,博士生要培养学术志趣,把对学术的热爱融入生命之中,把捍卫真理作为毕生的追求。博士生更要学会如何面对干扰和诱惑,远离功利,保持安静、从容的心态。学术精神特别是其中所蕴含的科学理性精神、学术奉献精神不仅对博士生未来的学术事业至关重要,对博士生一生的发展都大有裨益。

独创性和批判性思维是博士生最重要的素质

博士生需要具备很多素质,包括逻辑推理、言语表达、沟通协作等,但是最重要的素质是独创性和批判性思维。

学术重视传承,但更看重突破和创新。博士生作为学术事业的后备力量,要立志于追求独创性。独创意味着独立和创造,没有独立精神,往往很难产生创造性的成果。1929年6月3日,在清华大学国学院导师王国维逝世二周年之际,国学院师生为纪念这位杰出的学者,募款修造“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同为国学院导师的陈寅恪先生撰写了碑铭,其中写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是对于一位学者的极高评价。中国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所讲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也是强调要在古今贯通中形成自己独立的见解,并努力达到新的高度。博士生应该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来要求自己,不断创造新的学术成果。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曾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到访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90多名中国学生、学者提出:“独创性是科学工作者最重要的素质。”杨先生主张做研究的人一定要有独创的精神、独到的见解和独立研究的能力。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学术上的独创性变得越来越难,也愈加珍贵和重要。博士生要树立敢为天下先的志向,在独创性上下功夫,勇于挑战最前沿的科学问题。

批判性思维是一种遵循逻辑规则、不断质疑和反省的思维方式,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人勇于挑战自己、敢于挑战权威。批判性思维的缺乏往往被认为是中国学生特有的弱项,也是我们在博士生培养方面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2001年,美国卡内基基金会开展了一项“卡内基博士生教育创新计划”,针对博士生教育进行调研,并发布了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在美国和

欧洲,培养学生保持批判而质疑的眼光看待自己、同行和导师的观点同样非常不容易,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必须要成为博士生培养项目的组成部分。

对于博士生而言,批判性思维的养成要从如何面对权威开始。为了鼓励学生质疑学术权威、挑战现有学术范式,培养学生的挑战精神和创新能力,清华大学在2013年发起“巅峰对话”,由学生自主邀请各学科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大师与清华学生同台对话。该活动迄今已经举办了21期,先后邀请17位诺贝尔奖、3位图灵奖、1位菲尔兹奖获得者参与对话。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巴里·夏普莱斯(Barry Sharpless)在2013年11月来清华参加“巅峰对话”时,对于清华学生的质疑精神印象深刻。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道:“清华的学生无所畏惧,请原谅我的措辞,但他们真的很有胆量。”这是我听到的对清华学生的最高评价,博士生就应该具备这样的勇气和能力。培养批判性思维更难的一层是要有勇气不断否定自己,有一种不断超越自己的精神。爱因斯坦说:“在真理的认识方面,任何以权威自居的人,必将在上帝的嬉笑中垮台。”这句名言应该成为每一位从事学术研究的博士生的箴言。

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有赖于构建全方位的博士生教育体系

一流的博士生教育要有一流的教育理念,需要构建全方位的教育体系,把教育理念落实到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中。

在博士生选拔方面,不能简单按考分录取,而是要侧重评价学术志趣和创新潜力。知识结构固然重要,但学术志趣和创新潜力更关键,考分不能完全反映学生的学术潜质。清华大学在经过多年试点探索的基础上,于2016年开始全面实行博士生招生“申请-审核”制,从原来的按照考试分数招收博士生转变为按科研创新能力、专业学术潜质招收,并给予院系、学科、导师更大的自主权。《清华大学“申请-审核”制实施办法》明晰了导师和院系在考核、遴选和推荐上的权利和职责,同时确定了规范的流程及监管要求。

在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确认方面,不能论资排辈,要更看重教师的学术活力及研究工作的前沿性。博士生教育质量的提升关键在于教师,要让更多、更优秀的教师参与到博士生教育中来。清华大学从2009年开始探索将博士生导师评定权下放到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允许评聘一部分优秀副教授担任博士生导师。近年来学校在推进教师人事制度改革过程中,明确教研系列助理教授可以独立指导博士生,让富有创造活力的青年教师指导优秀的青年学生,师生相互促进、共同成长。

在促进博士生交流方面，要努力突破学科领域的界限，注重搭建跨学科的平台。跨学科交流是激发博士生学术创造力的重要途径，博士生要努力提升在交叉学科领域开展科研工作的能力。清华大学于2014年创办了“微沙龙”平台，同学们可以通过微信平台随时发布学术话题、寻觅学术伙伴。3年来，博士生参与和发起“微沙龙”12000多场，参与博士生达38000多人次。“微沙龙”促进了不同学科学生之间的思想碰撞，激发了同学们的学术志趣。清华于2002年创办了博士生论坛，论坛由同学自己组织，师生共同参与。博士生论坛持续举办了500期，开展了18000多场学术报告，切实起到了师生互动、教学相长、学科交融、促进交流的作用。学校积极资助博士生到世界一流大学开展交流与合作研究，超过60%的博士生有海外访学经历。清华于2011年设立了发展中国家博士生项目，鼓励学生到发展中国家亲身体验和调研，在全球化背景下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各类问题。

在博士学位评定方面，权力要进一步下放，学术判断应该由各领域的学者来负责。院系二级学术单位应该在评定博士论文水平上拥有更多的权力，也应担负更多的责任。清华大学从2015年开始把学位论文的评审职责授权给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学位论文质量和学位评审过程主要由各学位分委员会进行把关，校学位委员会负责学位管理整体工作，负责制度建设和争议事项处理。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核心。博士生培养质量的提升是大学办学质量提升的重要标志。我们要高度重视、充分发挥博士生教育的战略性、引领性作用，面向世界、勇于进取，树立自信、保持特色，不断推动一流大学的人才培养迈向新的高度。



清华大学校长

2017年12月5日

丛书序二

以学术型人才培养为主的博士生教育,肩负着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层次学术创新人才的重任,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清华大学人才培养的重中之重。

作为首批设立研究生院的高校,清华大学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立足国家和社会需要,结合校内实际情况,不断推动博士生教育改革。为了提供适宜博士生成长的学术环境,我校一方面不断地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一方面大力推动培养模式创新探索。我校已多年运行一系列博士生培养专项基金和特色项目,激励博士生潜心学术、锐意创新,提升博士生的国际视野,倡导跨学科研究与交流,不断提升博士生培养质量。

博士生是最具创造力的学术研究新生力量,思维活跃,求真求实。他们在导师的指导下进入本领域研究前沿,吸取本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拓宽人类的认知边界,不断取得创新性成果。这套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丛书,不仅是我校博士生研究工作前沿成果的体现,也是我校博士生学术精神传承和光大的体现。

这套丛书的每一篇论文均来自学校新近每年评选的校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为了鼓励创新,激励优秀的博士生脱颖而出,同时激励导师悉心指导,我校评选校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已有20多年。评选出的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代表了我校各学科最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为了传播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成果,更好地推动学术交流与学科建设,促进博士生未来发展和成长,清华大学研究生院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这些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

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悉心地为每位作者提供专业、细致的写作和出版指导,使这些博士论文以专著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促进了这些最新的优秀研究成果的快速广泛传播。相信本套丛书的出版可以为国内外各相关领域或交叉领域的在读研究生和科研人员提供有益的参考,为相关学科领域的发展和优秀科研成果的转化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感谢丛书作者的导师们。这些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从选题、研究到成文，离不开导师的精心指导。我校优秀的师生导学传统，成就了一项项优秀的研究成果，成就了一大批青年学者，也成就了清华的学术研究。感谢导师们为每篇论文精心撰写序言，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论文。

感谢丛书的作者们。他们优秀的学术成果，连同鲜活的思想、创新的精神、严谨的学风，都为致力于学术研究的后来者树立了榜样。他们本着精益求精的精神，对论文进行了细致的修改完善，使之在具备科学性、前沿性的同时，更具系统性和可读性。

这套丛书涵盖清华众多学科，从论文的选题能够感受到作者们积极参与国家重大战略、社会发展问题、新兴产业创新等的研究热情，能够感受到作者们的国际视野和人文情怀。相信这些年轻作者们勇于承担学术创新重任的社会责任感能够感染和带动越来越多的博士生们，将论文书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祝愿丛书的作者们、读者们和所有从事学术研究的同行们在未来的道路上坚持梦想，百折不挠！在服务国家、奉献社会和造福人类的事业中不断创新，做新时代的引领者。

相信每一位读者在阅读这一本本学术著作的时候，在吸取学术创新成果、享受学术之美的同时，能够将其中所蕴含的科学理性精神和学术奉献精神传播和发扬出去。



清华大学研究生院院长

2018年1月5日

导师序言

简论信息社会的知识问题

——从国外教育理论的借鉴谈起

看到眼前许甜博士的这本专著《从社会建构主义到社会实在论：麦克·扬教育思想转向研究》，不由得想起了20世纪90年代末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期间的某天夜间，突然接到刚刚从美国访学归来的朱旭东教授的电话，畅聊甚欢，兴奋不已。言语间谈到教育学科建设中学习和借鉴国外教育理论的问题，对此，我们都有一种共同的感觉：即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中国教育界的学者们积极翻译国外重要的教育学术著作，引进先进与前沿的教育思想，促进了中国教育学科的建设。然而，我们也都发现，在这种新的“西学东渐”浪潮中，似乎有这样三种现象：一是关于西方教育学著作和思想的引进常常比较零散，虽然也有不少丛书，但缺乏对某个教育学家或流派的长期系统的研究；二是翻译的文献专著比较多，而对这些译著与思想进行的专门的研究却相对比较少；三是在教育学术界好像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对国外教育理论著作的解读与研究是一件学术水平比较低的介绍性的工作，以至于在学术评价系统中也没有能够得到足够的重视。这显然与早期教育界对杜威等教育家著作与思想的大量研究是不同的；而且与人文社会科学界其他学科领域的情况也有所差距。按照熊十力先生的看法，这种现象实际上反映了“吾国学人总好追逐风气，一时之所尚，则群起而趋其途，如海上逐臭之夫，莫名所以”。（熊十力著《十力语要》，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56页）显然，这对中国教育界真正客观系统与科学地学习西方教育思想是不利的。言谈间，我们也提到应该鼓励学者加强这些方面的研究工作，促进中国教育学科的建设。当然，我们自己也责无旁贷。也正是在这种考虑下，朱旭东教授与我合作翻译了英国著名教育家麦克·扬的《知识与控制》以后，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的王晓阳先生也与我一起翻译了他的《未来的课程》，朱旭东、文雯和许甜又翻译了他的《把知识

带回来——从社会建构主义到社会实在论》一书，进而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麦克·扬的教育思想。而如今，许甜博士能够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坚持系统阅读与思考麦克·扬的教育论著与思想，并且专门到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跟随麦克·扬一起，进行学习、探讨与交流，在参考与借鉴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完成了她的这篇博士论文，获得清华大学优秀博士论文的奖励。这当然是遂了我的一个心愿。但我更愿意说的是，许甜博士这篇博士论文的价值与意义，实际上是体现了中国教育学科建设中学习借鉴国外教育思想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路径：即系统、客观与持续地研究国外某个教育学家的思想发展脉络及其变化。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了解和认识某位思想家的观点，把握国外教育思潮的发展变化，避免只言片语或断章取义的现象。

当然，麦克·扬的教育思想只是西方教育思潮中的一个微观片段，但他的思想观点及其发展变化却恰恰从某个方面反映了西方教育思潮的流变。而许甜博士的论文正是非常充分客观地描述与分析研究了这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君不见，作为舶来的建构主义理论在中国教育界曾经如何的“耀武扬威”，什么都是“建构”，一切都可以通过“建构”迎刃而解，教育改革营盘的“旗杆”上都飘起了“建构主义”的彩旗，而“建构”也顿时成为了教育界人士嘴边的语言“快餐”，“建构”似乎就意味着创新和现代。包括我自己也曾经为建构主义呐喊助威。特别是翻译了《知识与控制》这本被称为开拓了教育社会学新视野，并且被看作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尤其是看到麦克·扬把现代社会和教育的知识属性从“GIVEN”改变为“MAKING”，从而成为社会建构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以后，我也由此常常介绍这种建构主义的理论与意义。当然，应该承认的是，这种建构主义教育思想的确从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教育思想与学科的建设，推动了教育界的思想解放，也对我的教育与理论修养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但是，建构主义的缺陷与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尤其是把这种建构主义不加限制地推到极端时，由此所导致的相对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等则是非常危险的。实事求是地说，虽然朱旭东教授和我在翻译出版《知识与控制》的中文版译序中已经提到麦克·扬自己开始觉察到建构主义的这种问题，但我自己并没有足够的理论敏感去做更加深入的思考。而且，在进一步翻译和介绍麦克·扬的新书，不断了解他后期的思想变化之前，我仍然不知道他已经逐渐从一个建构主义者，转变为一个社会实在论者，而且对他自己过去的建构主义思想进行了一种比较深刻的理论反思与清算，进而又一次地成为了一种新的，我们尚不熟悉的教育思想的

开创者。或许麦克·扬的思想观点只是一家之言,甚至也可能是片面的,但西方教育界开始对建构主义进行反思,不断提出新的教育理念的趋势却是客观的。这种趋势和变化已经可以从许甜博士在参考文献中看到端倪。这样一种教育思想理论的变化趋势不应该也不能旁落在中国教育学术界的视野之外,而应该引起我们足够和充分的重视。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西方不同教育学家的观点去认识这种变化,但如果能够从一个人的思想发展历程去认识与研究这种变化,其理论价值与意义显然是不言而喻的。而这样一种对某个教育学家的思想变化的系统研究,的确是一种比较科学的学习借鉴国外教育思潮的科学态度,而这种教育理论研究的历史维度正是教育学科建设非常重要的路径。

显然,这种学习与研究国外教育理论的做法,不仅具有一种方法论的意义,而且能够具有非常实质性的价值。因为,正是在许甜博士对麦克·扬思想理论变化的描述和研究中,我们看到并且发现麦克·扬的社会实在论的知识观,很可能为我们认识现代社会和教育学理论中知识学说的发展与变化,即从工业社会的知识观到信息社会的知识观的发展,提供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分析路径与理论视角。

显然,知识是教育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个非常基础性的重要问题,也是反映和体现教育发展时代性及其发展的标志性问题。不同时代对知识性质与特点的看法往往是一个时代社会发展与教育发展的标志。诸如中世纪宗教的知识观,文艺复兴时期自然的知识观,17、18世纪理性与经验的知识观,以及现代社会中科学的知识观,等等,同时,斯宾塞所提出的:“什么知识是最有价值的知识?”建构主义中所隐含的“什么人的知识最有价值?”等,都是教育领域中具有标志性的知识观。更有甚者,根据有关工具书的看法,迄今为止学术界对知识的定义仍然缺乏共识。而麦克·扬的思想观点及其变化正是抓住和反映了这个教育理论与实践中的关键问题,进而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建构主义的知识观,开拓教育社会学的新方向与新视野之后,又在自我批判的基础上,于21世纪初提出并且论述了一种社会实在论的知识观。正如他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所做的学术报告“从当权者的知识到强有力的知识”所表达的那样,他试图解决当代知识观中出现的新矛盾,揭示它们的特点与性质。当然,他的理论主张和观点仍然有进一步深入和专业化讨论与磋商的空间与必要性,而且也正在成为一个学术讨论的话题,但毋庸置疑的是,麦克·扬的思考及其思想观点的发展的确给我们提出了一

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在近代社会重视和强调客观与实证的知识观，而现代社会推崇知识的建构性与情境性，进而到如何重新建立一种新的适应信息网络空间的知识观？这不能不是一个关系到教育学基本理论与实践的重大问题。

2017年，文雯、许甜与我曾经一起在《教育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把教育带回来——麦克·扬对社会建构主义的超越与启示”的文章，并且将其作为即将翻译出版的麦克·扬的新作《把知识带回来——从社会建构主义到社会实在论》的中文版序言。在那篇文章中，我们探讨了麦克·扬是如何把被建构主义引向相对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知识带回来，进而将知识的客观性和实证性与知识的建构性和情境性等有机结合起来的路径与理论，从而进一步超越了传统实在论与建构主义的局限，深化和拓展了知识观的发展前景与空间。然而，许甜博士关于麦克·扬思想发展变化的研究实际上又进一步启发了我的思考：这种所谓的社会实在论的知识理论，特别是它关于知识的客观性的重新说明与定义，从某种程度上是不是可以作为认识信息社会中知识现象的新特征与新形态，及其对传统知识观的挑战，为我们提供某种理论铺垫或方法论的准备呢？

显然，信息社会相对于工业社会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发展。如果说，在从传统的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通过蒸汽机等科学技术的革命性变革，人们的生存空间获得了极大的拓展；而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过程中，我们已经能够非常清楚地认识到，通过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特别是通过互联网而创建的网络世界，人类的思维空间在传统生存空间的基础上则是得到了无限的拓展。显然，这种信息社会中网络空间的知识形态和属性，与工业社会现实空间中的知识形态与属性是有所不同的。虽然我自己对这个方面的研究还非常的初步与浅薄，但一个十分强烈的感觉是：这种网络空间中的知识可能很难被传统知识观的存在形态或特征同化，很难简单地以传统知识观所谓实证性的方法与客观性标准进行证明，也无法直接根据传统的知识理论进行解释。因为，如果按照以往有关词典对“知识”的定义，所谓的“知识”，“从认识论的角度看，知识乃是人脑对客观规律的反映，是人类认识自然界，认识社会和人的精神产物；是人类在经验基础上的系统概括”（颜庆祥等主编《教育百科辞典》，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274页）而信息社会中网络空间的知识现象，则具有非常明显的主观形态和虚拟性，它们反映的是人们思维活动的产物，是一种想象的产物，

甚至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符号。虽然它们是一种对虚拟世界或虚拟现实的认识和反映,但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否定这种知识现象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如同信息社会中网络空间的真实性与客观性一样。而且,尽管我们对这种网络空间中知识现象的内在规律缺乏必要的基本认识,但这种新的知识现象已经毫不客气地开始“为难”传统知识观及其思维方式。君不见,由于这种网络空间中新知识的出现与冲击,人们已经喊出了“post-fact world”(后事实的世界),以及“post-truth world”(后真相的世界)的概念。(这是2017年11月在卡塔尔召开的“世界教育创新峰会”上提出的关键概念)且不论这些新概念的具体涵义如何,不容忽视的是,信息社会中网络空间的各种形态的知识现象已经实实在在地介入了传统现实空间中的知识体系,并且已经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现实生活与教育实践,扰乱着过去由现实的客观知识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所创立的秩序,或者说正在“破坏”着依据现实知识而形成的传统行为规范与道德准则,成为了一种具有新的现实形态的精神和心理活动,正在构成着一种新的独特的生存与交往方式。换句话说,现代社会中知识的连续性已经出现了某种“裂痕”,网络空间中的知识如何与现实世界中的知识秩序相互协调而一体化,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知识界和教育界的一个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

实事求是地说,这种现代社会知识脉络中的“裂痕”,正是知识理论中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由来已久的内在张力。它并不是21世纪的新问题,而是长期以来一个十分传统的哲学问题,从古希腊罗马时代智者的辩驳,到17、18世纪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争论,乃至现代社会中各种各样不同流派的相互纠缠,等等。而麦克·扬所提出的社会实在论的知识观则同样是力图调和这种内在矛盾的一种尝试。我在阅读和研究麦克·扬的社会实在论的知识理论与许甜博士的论文时所形成的一种理论猜想是,信息社会中网络空间的新知识的出现与发展,很可能正在将知识观的这种内在矛盾推向了一个必须进行库恩所谓“科学革命”而发生规范转换的时候。

或许信息社会中网络空间的知识现象及其发展还没有充分地暴露它内在的矛盾,因而也还没有能够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但它已经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引起和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和冲击。而且,由于这种网络空间的知识本身并没有得到必要与及时的梳理和分析,更遑论对网络空间的各种思维活动与精神交流进行必要的系统化和类型化,人们在网络空间中的知识活动已经出现了若干新的特征,进而与现实知识观发生着各种各样的

碰撞。此类现象在现实社会中大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这种网络空间中的知识现象与发展给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或者说,它进一步拓展了人们生活世界的主观性,进而不断放大着人们生活的内在矛盾与张力。如同人们在工业社会可以获得更大的流动空间和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一样,信息社会中网络空间则是让人们获得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进而能够选择不同的存在方式与思维方式。事实上,信息社会中的网络空间本身是一个充满选择的世界;这里充斥着大量的信息,包括各种各样真实的、支离破碎的、带有强烈主观偏好的,以及片面和放大的知识。更加值得关注的是,这些网络空间的知识不仅与现实空间的知识彼此之间缺乏连续性,而且,这种网络空间的知识现象本身之间也是不连续的。但就是这些碎片化,甚至彼此矛盾的知识,已经成为了人们建构自己生存空间与价值系统的重要内容和资源,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和意愿去选择不同的知识与信息,来建构自己的精神世界及个人的价值取向,并由此与他人教学交流,进而证明自己的观点,形成对自己、他人、社会和世界的判断。由此,它也进一步促进了社会和文化的多元化,并对现实社会的凝聚模式与整合机制形成了非常严峻的挑战。

第二,这种网络空间的知识发展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分离和矛盾,甚至于个体的人格分裂,以及人的内心与外表、里层与表层的相互对立与冲突。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已经可以在网络空间中使用另外一套语言和交流方式。例如,在网络世界中已经逐渐广为流传“二次元”“快手”“B站”等网站及其语言交流系统,其中某些网络符号的涵义与它们词源的本意已经是大相径庭,等等。而这些符号的新内涵完全是一种主观的赋予,是一种只能在部分会意的网民中流行的限制型语言编码。而更多的网民则是通过网络空间建构自己的一种生存方式,例如所谓的“吃播”,竟然可以将个人的吃相在网络上进行传播,以满足某些人的需求,进而成为一种独特的意义系统,并且以一种网络的方式重新塑造着某些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甚至有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开始探讨一种以互联网和网络空间为基础的新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形态,例如电商的发展与支付宝等新的金融形态,正在改变着社会的经济形态。根据《中华读书报》的介绍,日本知名作家平野启一郎先生新近有一部小说《无脸裸体群》,反映的就是这样一种网民的生存方式以及由此带来的困扰。小说的“女主人公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地方中学教师。她认为跟约会网站上认识

的男人交往的自己,都不是‘真正的自己’,只不过是表演出来的‘虚假的自己’。但是,她在现实生活中最多只与几个人有过短暂关系,在网上却得到了几万男性的热烈支持。于是,这便成为了一种奇妙的平衡关系,让她能够为此忍受现实生活的无聊,渐渐地,她分不清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己’”。(参看2017年9月13日《中华读书报》,平野启一郎:网络时代的“分人”和资本主义持续动荡时期的忧郁)而这些新的语言交流方式、生存方式、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如何与现实的各种生存方式等进行有效的融合,也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治理的挑战与问题。

第三,这种网络空间的知识现象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与个体的内在冲突,成为现代社会中人们自我认同,或者回答“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的一个十分尖锐的挑战。平野启一郎在上海书展的演讲《我是谁:从个人到“分人”》,正是表达了这样一个矛盾。他认为,在日常生活中,与不同的人进行交流,我们不得不变成各种各样的脸,自己明明是一个不可分的人,但是在面对不同的人的时候,又不得不变成不一样的自己。那么,在网络空间中,人的这种自我分化现象将获得更大的空间和可能。其实,这个矛盾从欧洲浪漫主义时代开始就令人们非常烦恼。也就是说,明明真正的自己只有一个,但是在社会生活中,自己就会变成各种各样不同的脸,这些脸只不过是自己的演技和面具,只不过是谎言中的自己。这样的问题、这样的烦恼从当时到现在,仍然还在困扰着人们。为此,平野启一郎提出了一个“分人”概念:尽管每一个人都是不可分的同一个人,但他或她在与不同的他人交流的过程中,却常常戴着面具或者表演为不同的人,变成一个可分的“分人”。平野启一郎甚至认为,并不存在单一的或真正的个人,人都是在与不同的人交流过程中,在这样的人际关系中的不同的“分人”,而所有的“分人”其实都是真正的自我。但是,人们却往往为这种个人的不同形象和“变身”以及相互之间的差异与对立而感到苦恼和纠结,以至于进一步增加了“我是谁”或自我认同的难度。

当然,我们目前还不能完全认识网络空间中知识现象的特征,以及它们对现实社会的意义,但这种网络空间中新的知识现象,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问题和挑战,已经对现实的教育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不待言,信息社会中网络空间的知识现象与问题对教育的意义与影响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我个人认为,这种意义与挑战不仅仅是具体操作层面的变革,而更要命的是对教育基本理论的“宣战”,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信息社会的教育中知识本身内在秩序的重建问题。显然,如何将现实空间的知识与网络空间的知识协调起来,这已经成为现代教育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巨大挑战。一方面,网络空间中知识的零散性、多样化,以及彼此之间的相互冲突,使其呈现出一盘散沙的格局,而很难实现一定程度的内在整合与内在秩序;另一方面,这种网络空间中知识的主观性、情境性与个体性等特征,甚至是对现实的变形、反经验性,以及对常识的颠覆,使其与现实的知识体系形成某种似乎大相径庭的取向。更有甚者,人们开始利用这种网络空间的知识去表达世界与生活的意义,以及利用网络空间中知识现象的某些特征来比照现实社会,作为一种价值判断与评价的参照系。而这些与现实的知识、经验与价值观常常是相互矛盾和冲突的,并且很难形成一个具有连续性的统一的知识体系。然而,这种知识的连续性与内在秩序又是教育活动的必要条件。从微观上看,这种知识的连续性与内在秩序正是学制的根据,是学校教育及其课程建设的重要基础,对学生的学习与经验再造具有非常根本性的重要影响。甚至可以认为,没有这种知识的连续性与秩序,严格意义的学习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从宏观上看,这种知识的连续性与内在秩序,按帕森斯关于教育应该具有潜在的模式维护的社会功能的观点,也正是现代教育履行其社会责任的基本条件。

其次,这种教育知识的连续性与秩序问题则是直接关系到教育中个体成长过程中的自我认同,尤其是对现实的自我认同的路径和模式形成了具有颠覆性的冲击。因为,如何帮助和引导儿童和青少年实现“自我认同”或“身份认同”,即认识他自己,是教育的一个十分根本性的功能与责任。在传统和简单的现实社会中,由于生存空间的狭隘与有限性,这种自我认同和身份认同是比较容易和简单的。但是,在信息社会的网络空间中,由于生存空间与思维空间的无限扩大,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也有了更多的途径与可能性,由此形成的反馈也越来越多样化。换句话说,如果按照西方社会学家库利的“镜中我”的理论,现代信息社会及其网络空间中的这块“镜子”已经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多样化。而每个人在这些各种各样的“镜子”中看到的自我也呈现出越来越多,甚至是彼此矛盾的形象。究竟哪一块“镜子”中反映出来的“我”才是真正的自己呢?或者究竟这些“镜子”中映照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我”的共性是什么?在这种背景中,教育对于帮助和引导人们实现人的自我认同将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会发现自己的“分人”越来越多、越来越不一样,以至于它们本身也充满了差异,根本就很难从中找到某个真正